

儒家
文艺思想视野下的
文史研究新探
王万洪
黄健平
郭国庆
王姝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儒家

RUJIA WENYI SIXIANG SHIYE XIA DE
WENSHI YANJIU XINTAN

文艺思想视野下的 文史研究新探

王万洪 黄健平 郭国庆 王 姝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 凯
责任校对:孟庆发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家文艺思想视野下的文史研究新探 / 王万洪等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5614-7619-2

I. ①儒…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汉代②私人藏书—研究—中国—清代③长篇小说—小说研究—日本—中世纪④《三国演义》研究
IV. ①I206. 2②G259. 258. 3③I313. 074④I207. 4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75411 号

书名 儒家文艺思想视野下的文史研究新探

著 者 王万洪 黄健平 郭国庆 王 姝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7619-2
印 刷 四川永先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7
字 数 174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http://www.scup.cn>

序

2500 多年前，孔子集虞、夏、商、周优秀文化于一体，创立儒学，聚徒讲学，形成了儒家学派。西汉时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获得了独尊的地位，在中国古代社会持续了 2000 余年。近代以来，在“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等思潮的冲击下，儒家文化辉煌不再，危机四伏。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强盛，复兴民族文化、提高文化软实力成为国家的战略需要，儒家文化再度引起人们的重视。汤一介、李中华先生主编的九卷本《中国儒学史》，舒大刚先生主编的三卷本《儒学文献通论》等代表性成果陆续出版，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主持的儒学文献集大成之作《儒藏》的编纂正在进行之中，儒学研究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古代与现实社会中的许多问题，只有纳入儒家文化的视野之中，才能得到深入的理解和切实的解答。从这个角度而言，儒学研究仅仅关注儒学基本经典、儒学杰出人物以及儒学发展史的宏观梳理是远远不够的。儒学研究应该是多元的，某一个领域、某一部作品、某一种现象等都可以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这样才能全面、具体、生动地展现儒家文化的传播与影响。本书所收的三篇文章，就是儒学研究多元化的尝试之作。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巅峰之作，汉代巴蜀思想家、文学家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对《文心雕龙》的成书作出了重要贡献。《文心雕龙》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如《原道》篇阐释了儒家圣人与儒家经典在人文历史上的主导作用，《征圣》篇指出儒家圣人具有最高的美言美行，《宗经》篇具体提出“文出五经”的观点等。以扬雄《法言》等为代表的著述，是《文心雕龙》以儒家文艺思想为主导的创作论和审美论的重要来源。《汉代巴蜀三杰与〈文心雕龙〉》以儒学、区域人物与文化为视角，对研究《文心雕龙》文艺思想的来源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日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儒家文化圈”的重要国家之一。《三国演义》与《平家物语》是中日两国文学史上家喻户晓的名著，都受到了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平家物语〉与〈三国演义〉儒家文化之比较》分析了中国儒家文化在东传日本之后，日本民族对儒家文化接受利用的发展脉络；文中通过文化考察和文本细读，揭示了两书忠义观、天命观和女性观的异同，指出同一文化在不同民族国家中的传承，在不同时期会发生不同的断裂和选择，从而对文化传统的积淀产生不同的导向。文化主导着文学发展的方向，同时文学也对文化的积淀和选择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平家物语〉与〈三国演义〉儒家文化之比较》对理解文学与儒学的互动以及研究儒学在异域的传播与影响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马国翰是清代著名的辑佚学家、藏书家，辑有《玉函山房辑佚书》，编有《玉函山房藏书簿录》。《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辑录佚书 422 余种，《子编·儒家类》辑录佚书 68 种。马国翰共辑佚儒学佚书 490 种，约占其所辑佚书总数的 80%，为儒学研究提供了大量极有价值的文献资料。《玉函山房藏书

簿录·经部》著录图书 1048 部，《子部·儒家类》著录图书 197 部。马国翰收藏的儒学著作共计 1245 部，约占其藏书总量的 30%，是他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辑佚第一家：马国翰藏书研究》分析了马国翰藏书的来源、种类、数量、版本、应用以及《玉函山房藏书簿录》提要的主要内容，从文献传播的角度展现了儒学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

王万洪、黄健平、王姝与我共同问学于四川大学。四川大学既有深厚的儒学研究传统，也是当前国内儒学研究的重镇，我们四人能够合作出版《儒家文艺思想视野下的文史研究新探》，也算是人生的一种机缘吧。

郭国庆

2014 年 3 月 15 日于贵阳花溪河畔

目 录

汉代巴蜀三杰与《文心雕龙》	(1)
一、序论：树德建言，扬雄影响	(5)
二、文之枢纽：五经含文，三杰模范	(7)
三、论文叙笔：蜀中三杰对《文心雕龙》文体论的影响	(37)
四、剖情析采：巴蜀三杰在创作论中的突出贡献	(53)
结 语	(73)
清代辑佚第一家：马国翰藏书研究	(75)
一、藏书来源	(77)
二、藏书种类与数量	(84)
三、藏书版本	(99)
四、藏书应用	(113)
五、《玉函山房藏书簿录》内容解析	(123)
《平家物语》与《三国演义》儒家文化之比较	(145)
一、绪 论	(147)
二、神道和魂与剑胆琴心	(153)
三、盛者必衰与成王败寇	(170)
四、女性：政治的符码与人情的寄托	(183)
结 语	(201)
参考书目	(205)
后 记	(212)

汉代巴蜀三杰与《文心雕龙》

成书于南朝齐梁之际的《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巅峰之作。通观《文心雕龙》全书，其中对汉代蜀中思想家、文学家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的论述非常多，巴蜀三杰^①每每出现于“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剖情析采，笼圈条贯”

^① 刘勰在《文心雕龙·铨赋》篇中称荀况、宋玉、枚乘、司马相如、贾谊、王褒、班固、张衡、扬雄、王延寿十人为“辞赋之英杰”，顺此，有研究者简称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三人为汉代“蜀中辞赋三英杰”。实际上，从三人的创作成果目录与《文心雕龙》对三人的实际征引来看，称他们为“蜀中辞赋三英杰”是不妥当的，准确的称呼应是“汉代巴蜀文学三英杰”，因为他们的文学创作远远不止辞赋体裁。因此，称“辞赋三杰”范围过窄，有以偏概全之嫌，故而本文以“汉代巴蜀文学三杰”称之，简称巴蜀三杰。因为刘勰没有引述过严遵的作品或思想，因此，本文暂不采用班固《汉书》所说的“四杰”之谓。



的重要位置^①，作为《文心雕龙》全书文学思想、作家作品、创作得失、理论批评的经典代表，其文学创作与文艺思想是刘勰创作该书的重要取材对象。具体说来，王褒主要以辞赋创作成就影响《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与辞赋观，司马相如与扬雄则不仅以其卓越的创作成为划时代的经典作家代表，在《文心雕龙》的枢纽论、作品论、思维论、风格论、修辞论、作家论、鉴赏论、时序论、通变论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而且以其文艺理论思想深刻影响了《文心雕龙》的文学思想、美学观念与创作目的。在以往的“龙学”研究中，对汉代蜀中三杰的杰出贡献关注甚少^②，故本文对此略作探讨，以求抛砖引玉，将巴蜀三杰为《文心雕龙》的产生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揭示出来。

① 《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清人章学诚以“体大思精”目之，被“龙学”研究界公推为定论。在《序志》篇中，刘勰自述其书之结构体系曰：“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固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擢《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昭恨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衍）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刘勰将《文心雕龙》分为四个部分：从《原道》至《辨骚》这五篇以“文之枢纽”目之，可称为枢纽论；从《明诗》到《书记》这二十篇属于“论文叙笔，固别区分”的文体论；《神思》到《程器》二十四篇属于全面的“剖情析采，笼圈条贯”部分，学术界一般将其分为创作论（《神思》至《总术》）与批评论（《时序》至《程器》）两块；最后是总纲性质的《序志》一篇，称为序论。在具体阅读或研究的时候，一般将序论放在最前面，枢纽论作为核心理论纲要紧随其后，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作为展开的主体，依次放在后面。这样安排顺序的好处是由小到大，可以更好地还原《文心雕龙》理论体系从缘起、纲领到全面论述的脉络顺序。

② 直接论述司马相如与《文心雕龙》的论文只有高林广先生《文心雕龙的司马相如辞赋批评》一文〔《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直接论述王褒、扬雄与《文心雕龙》的论文还没有。

一、序论：树德建言，扬雄影响

刘勰在《序志》篇中明确告诉读者，《文心雕龙》的写作动机有三：一是求得令名，二是选择“文章”而不再解经，三是要写成写作理论著作，其根本目的是借《文心雕龙》彰令名、求不朽。刘勰以为生命脆弱，为了“树德建言”，一定要写本书留下来，这是古人“名德”思想直接影响的结果，蜀中学者扬雄是刘勰取法的重要对象。

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曾提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说，这三者是经久不废，流芳百世的。孔子则认为“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在立德、立功不成的情况下，述而且作，编次《春秋》，删《诗》正乐，名德俱彰。司马迁身遭宫刑，因为《史记》未完而坚持“退论书策”，他希望自己的著作能“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均有《史记》，“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报任安书》）司马迁同时认为，令名的追求是很困难的，一般人想的是如何享受富贵，轻身安乐，所以这种“发愤著书”的精神“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一般人做不到。

上述诸人之外，扬雄论“名”最多，集中体现在他的学术著作《法言》之中，对刘勰的影响也最大。^① 扬雄认为，圣人之所以被后人尊敬，是因为德行政教样样兼备，才能留下美好的名声。《重黎》篇提出“令名”一说，韩信、黥布因为叛逆汉室，名声虽有，但不足为法。《学行》论述学习，以为“名

^① 扬雄论“名”，是与“实”相联系，“名实”之论与《文心雕龙》的“文道”关系类似。



誉以崇之”是学者的必然追求。《孝至》篇则说：“不为名之名，其至矣乎！为名之名，其次也。”要求在追求美名声誉的时候，必须要有道义精神，因此，他主张通过修养德义来完善自我，再求令名。《渊骞》篇对蜀中名家李仲元极为推崇，显示了扬雄征圣不仅崇古，也法则近代的新变意识，其主要原因就是李仲元名德昭彰，榜样感化力量十分巨大。同时，扬雄还主张以实际行动来彰显令名，《先知》篇论述“为政日新”的重要一环，就是“乐其义，厉之以名，引之以美，使之陶陶然”，重视美言美行，感化教育。《君子》篇提出实际行动对建立美名的重要作用，“人必先作，然后人名之”，要求在行动上有过人之处，美名才会得到彰显。在此基础上，扬雄对君国将相、功臣名卿有自己辩证的看法，《渊骞》篇论述“近世名将”“近世名卿”以及外交大臣、著名作家几十人，在赞美他们功德的同时，也批评他们不合儒家教义的地方。上述汉代名人大量出现于《文心雕龙》一书中，对刘勰论述“文士将相”与“九代文学”有直接影响。扬雄不仅倡导名德思想，更在立言不朽方面作出了实践表率，《汉书·扬雄传·赞》说他“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①诚然，如果没有写成那么多著名的京都大赋和学术著作，扬雄之名不可能如此卓著。而扬雄晚年轻鄙辞赋，转向学术研究，仍然是“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立言不朽之心在继续推动着他的著述研究工作，使他在哲学思

① [东汉]班固：《汉书》（影印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595～3596页。

想、文字小学、应用写作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刘勰重视名德，深感生命脆弱：“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①因此，《文心雕龙》根本的写作目的是“树德建言”，至于成书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当前“龙学”研究的学术热潮，并不在他预设的创作动机之内。刘勰不仅渴求令名，而且以此为本，作为《文心雕龙》品评作家作品的基本标准，并极力在书中树立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所以，除了从文章体裁、写法技巧、风格特点、修辞技法、影响作用等方面来论述写作，还往往以儒家经典的思想标准来衡量历代作家作品的思想是否雅正、有无违背经典、有无奇谈怪说。跳出《文心雕龙》，考察刘勰的生平，可知从他托身定林寺、博通经纶、写作《文心》、拦道沈约，到出仕梁代、做官三十多年的大半生，都是在令名功德思想的支配下走过来的。刘勰毕生所坚持的令名功德心态，也是《文心雕龙》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重要证据。^②

二、文之枢纽：五经含文，三杰模范

在《文心雕龙》的序论中，扬雄立言不朽的理论与实践成就对刘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文心雕龙》的性质毕竟是写作理论著作而不是伦理学著作，因此，发展到“文之枢纽”的

① 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10页。

② 对于《文心雕龙》的主导思想，学术界有儒家主导说、道家主导说、佛家主导说、三教合一说四种主要意见。20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曾以此为中心进行了一场持续近十年的大辩论。从《文心雕龙》一书的写作理论性质来说，佛家主导说站不住脚；从书中序论、枢纽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的论述实际来看，道家文艺思想尽管对刘勰产生了重要的理论影响，但也不是本书的主导思想；三教合一说也因此不能成立；学术界的主流意见是儒家思想主导了《文心雕龙》从写作目的到文学思想的方方面面。



五篇专论时，就必须对写作的“枢纽”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这一部分最重要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树立儒家思想的指导地位和儒家经典的主导地位，二是从哲学高度提出人文尚丽的文学观念，并在具体作家作品的比较中落实到写作实践上来。在这两个问题中，巴蜀三杰均有重要的影响。

（一）扬雄《法言》与“圣文雅丽”

《文心雕龙》的枢纽论部分共有五个专题：《原道》《征圣》《宗经》《正纬》与《辨骚》。《原道》篇从哲学高度阐释了自然之道的华丽特点、人文原道必定“郁然有采”的基本属性、儒家圣人与儒家经典在人文历史上的主导作用等问题，其核心是“人文”有采，为后两篇论述儒家经典的“雅丽”之美打下理论基础。《征圣》篇指出儒家圣人具有最高的美言美行，其政化、事迹、修身均以“贵文”为要，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儒家经典就具有了“繁略殊形，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会适”的特征与写作技法，是学习写作的最高范本，而且“圣文雅丽，衔华佩实”，具有雅而且丽的审美风格，笼罩或雅或丽的一切文章。《宗经》篇具体提出“文出五经”的观点，认为《诗》《书》《礼》《易》《春秋》衍生出后代所有的文章体裁类型（事实上，从《明诗》到《书记》的二十篇文体论正是按照“五经发其源”的体例来设计安排的），同时指出五经具有美好的“六义”特点^①，学习五经，可以养成“六义”中优良的正

① 《文心雕龙·宗经》论此：“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笔者以为，《宗经》“六义”与《知音》“六观”应该合观统照，才能全面地看出刘勰对文学创作与鉴赏的理论阐释。

面写作技能，改正不良的写作弊端。^①《正纬》篇通过比较指出纬书具有丽而不雅的特点，“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写作可以借鉴，刘勰开始承认文章写作与儒家经典的区别。《辨骚》篇综述汉代五家评屈之论，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认为《楚辞》和经典相比较具有“四同”与“四异”，屈原的《楚辞》体现了最高的文采之美，是历代文学中最杰出的代表作品，影响后世，泽被千秋。^②

通过上面的简单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枢纽论的五个专题以《宗经》为核心，确立了儒家思想和儒家经典在全书的理论与创作主导地位。^③但这只是从指导思想角度说的，落实到具体的写作问题上，这五篇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点：极力主张文学尚丽。《原道》指出人文有采，这一基本属性为典而不美的儒家经典提供了具有文采之美的哲学依据，纬书与《楚辞》本就华美异常，这样，作为“人文”的经、纬、骚共有尚丽的属性，“文出五

① 对于“六义”的研究意见颇多。易中天先生将“六义”与风、骨、采合起来对接观照，得出“风骨”就是雅丽之文审美理想的看法；王志彬先生认为单看“六义”尚属片面，还应该结合《知音》篇“六观”说，二者的结合，才是《文心雕龙》批评论的整体意见；还有的研究者以为这是《文心雕龙》的创作论。实际上，“六义”的排列顺序是由情到文（采），转化来看，就是《情采》篇论述的文质关系说，以及如何正确创造彬彬“正采”的方法论。“圣文雅丽，衔华佩实”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分而为六是对雅丽的细化，合六为一是对雅丽的整合。雅丽即“六义”，不仅是创作原则，同时是审美原则与批评原则。

② 有的研究者认为《辨骚》篇应该归属于文体论部分，这是从文体归类的角度来看的，其说不妥：一则因为刘勰自述是将本篇列于“文之枢纽”部分；二则《辨骚》篇在论述《离骚》特点的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总结“枢纽”论五篇的核心内容，即文学创作应该在经典雅正得法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华丽之美，雅丽结合。从这个角度讲，纬书与《离骚》在本质上都是“丽而不经”的作品，《辨骚》以归入“枢纽”论为宜。

③ “文之枢纽”以《宗经》篇为核心，这是近年来《文心雕龙》研究的一个新的探究发现。一般认为，枢纽论部分应该以《原道》篇为核心；詹福瑞、孙蓉蓉、李建中等研究者则认为应该以《宗经》篇为核心，因为全书的指导思想是儒家文艺思想，笔者认同此说，同时认为《辨骚》篇专论文学创造的新变范例与诗骚结合、奇正结合的创作原则，这才是真正阐释文学写作之枢纽的篇目。



儒家

文艺思想视野下的
文史研究新探

RUJIA WENYI SIXIANG SHIYE XIA DE
WENSHI YANJIU XINTAN

经”在审美特点上不会被动摇。但是儒家雅正的文学观念与文学尚丽的基本属性交汇融合，必然会激荡出两个方向相反的基本观念：尚雅贬丽与雅丽结合，这一对矛盾互现的基本文学观念贯通于《文心雕龙》全书之中。

刘勰的主要选择是折衷经典之雅与纬骚之丽，走雅丽结合的路子。在《宗经》篇论述经典“六义”之后，刘勰引用扬雄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论断：“故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谓五经之含文也。”据此可知，刘勰提出经典之“六义”，论证经典具有文采之美，除了《原道》的哲学依据，在具体写作理论层面的根源，正是扬雄“五经含文”的主张。

扬雄的思想丰富深刻，整体上呈现出儒家为主而儒道结合的特点。在他的辞赋创作实践与学术著作中，我们可以梳理出许多对《文心雕龙》产生了直接影响的哲学、文学、美学思想，这些思想集中在其代表作《法言》之中，并表现于《报刘歆书》《反离骚》《太玄经》《汉书·扬雄传》等文献之中。自孔子以后，对《文心雕龙》雅丽思想影响最大的就是扬雄，这可以从《文心雕龙》全书三十八次直接论述扬雄所出现的重要

位置、若干次化用其“丽则丽淫”主张的运用情况清楚地看出来。^① 具体而言，扬雄对《文心雕龙》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

① 这三十八次论述分别是：《宗经》：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谓“五经”之含文也。《辨骚》：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辨骚》：马扬沿波而得奇。《诠赋》：王扬骋其势。《诠赋》：子云《甘泉》，构深伟之风。《诠赋》：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縠者也。《颂赞》：子云之表充国，孟坚之序戴侯，武仲之美显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拟《清庙》，或范《驹》《那》，虽深浅不同，详略各异，其褒德显容，典章一也。《铭箴》：至扬雄稽古，始范《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谏碑》：扬雄之谏元后，文实烦秽。《哀吊》：扬雄吊屈，思积功寡，意深反《骚》，故辞韵沈腿。《杂文》：扬雄覃思文阁，业深综述，碎文琐语，肇为《连珠》。《杂文》：扬雄《解嘲》，杂以谐谑，回环自释，颇亦为工。《杂文》：子云所谓“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者也。《诸子》：扬雄《法言》，归乎诸子。《封禅》：扬雄《剧秦》，班固《典引》，事非镌石，而体因纪禅。《书记》：扬雄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书记》：史迁之《报任安》，东方之《谒公孙》，杨恽之《酬会宗》，子云之《答刘歆》：志气槃桓，各含殊采；并杆轴乎尺素，抑扬乎寸心。《神思》：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辍翰而惊梦。《体性》：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通变》：桓君山云：“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见刘扬言辞，常辄有得。”《通变》：扬雄《校猎》云：“出入日月，天与地杳”。《丽辞》：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比兴》：至于扬班之伦，曹刘以下，图状山川，影写云物，莫不织综“比”义，以敷其华。《夸饰》：及扬雄《甘泉》，酌其余波；语瑰奇则假珍于玉树；言峻极则颠坠于鬼神。《夸饰》：子云《羽猎》，鞭宓妃以餮屈原。《夸饰》：酌《诗》《书》之旷旨，翦扬马之甚泰。《事类》：及扬雄《百官箴》，颇酌于《诗》《书》。《事类》：以子云之才，而自奏不学；及观书石室，乃成鸿采；表里相资，古今一也。《事类》：夫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扬、班以下，莫不取资。《练字》：扬雄以奇字纂《训》。《练字》：陈思称：“扬、马之作，趣幽旨深，读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时序》：乐毅报书辨以义，范雎上书密而至，苏秦历说壮而中，李斯自奏丽而动；若在文世，则扬、班俦矣。《时序》：子云锐思于千首，子政雠校于六艺，亦已美矣。《才略》：扬子以为“文丽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才略》：子云属意，辞人最深，观其涯度幽远，搜选诡丽，而竭才以钻思，故能理赡而辞坚矣。《知音》：扬雄自称：“心好沉博绝丽之文。”其不事浮浅，亦可知矣。《程器》：扬雄嗜酒而少算。《程器》：彼扬马之徒，有文无质，所以终乎下位也。其重点有三：一是在《宗经》《事类》等篇目中论述扬雄的宗经观点；二是引用扬雄的文学理论见解，为论述作论据；三是以扬雄的作品为对象，进行审美与创作的评价。整体上看，扬雄具有经学家、文学家、理论家的数重身份，刘勰论述扬雄，赞美非常之多。而扬雄辞赋评论“丽淫丽则”的主张，更是雅丽思想直接取法的对象，书中若干次运用或化用之。总而言之，扬雄是继孔子之后，对雅丽思想影响最大的儒家人物。